

敦煌“贺雨文”初探

赵玉平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敦煌文书中有题为“贺雨”的文书数篇。本文通过对其内容及使用者的比较研究,认为敦煌文书中的“贺雨”题材是朝廷礼仪地方化、政治文体民间化、宗教化的体现。

关键词 唐代;敦煌文书;贺雨文;礼制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09)03-0070-03

Discussion of Dunhuang “Celebrate Rain”

ZHAO Yu-ping

Abstract: There are several articles entitled “Celebrate rain”(贺雨) in the Dunhuang Primers. The author of the paper, through his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ntents and the users, believes the “Celebrate rain”(贺雨) theme in the Dunhuang Primers is the embodiment of localization of court etiquette and the folk and religious ways of political style.

Key words: Tang Dynasty; Dunhuang Primers; celebrate rain; etiquette

敦煌文书S.3399《杂相贺语》、P.3625《书仪》、P.2652《诸杂谢贺》及P.3637《杜友晋撰〈新定书仪镜〉》中都有贺雨这一题材,为官方或家族所用之贺语。

S.3399《杂相贺语》“贺雨”^[1]条:

太阳愆殃,时雨稍乖,尚书亲祷自祈,甘泽应期滂足,人心顿安。某乙等,忝伏事旌麾。下情无任抃跃。

P.3625《书仪》“贺雨”^[2]条:

伏以时久愆阳,民方思渴,滂泽忽降于膏润,田苗益救于焦劳,某忝伏事旌幢。下情无任喜跃。

P.2652《诸杂谢贺》“贺嘉雪(雨)”^[3]条:

彤云初布、嘉雨纷飞。不惟东作重望,寔亦西成有秩。某乙等,忝伏事旌麾。下情无任庆抃。

P.3637《杜友晋撰〈新定书仪镜〉》^[4]“四海庆贺书内外族同”中的“贺雨书”^[5]:

久旱忽降膏雨,稼穡有望,想同喜慰。

S.3399《杂相贺语》中包含“贺本使语”、“参天使语”、“端午日赐扇”、“贺破贼语”、“城中有祥瑞贺语”、“贺雨”、“谢分散例物”、“贺天公主”等十九首题目(“参天使语”为两首)。P.3625《书仪》与P.

2652《诸杂谢贺》与S.3399《杂相贺语》内容大致相同。P.3637《杜友晋撰〈新定书仪镜〉》“四海庆贺书内外族同”下有“重贺官书”、“贺平贼书”、“贺及第书”、“贺雨书”等共八篇。

S.3399、P.3625、P.2652中的“贺雨”相似之处有二:一、文体简短,结尾处都有“某乙等,忝伏事旌麾。下情无任庆抃”类结语,为公文统一结语,既有报告之意,也表达欢喜之情;二、“贺雪”皆紧随“贺雨”之后(P.2652中为“贺嘉雪(雨)”一文两用),且两者文体、措词及结尾方式也大致相同。P.3625、P.2652及P.2652的使用者为归义军中的官僚(甚至是高级官员),这一点从“参天使语”、“屈天使赴宅”、“分散例物目”等重要官方活动中可以看出。“忝伏事旌麾”亦表明作者是以下级身份向上级贺喜,受贺者很有可能就是节度使。

“贺雨”、“贺雪”乃至“贺祥瑞”之类,是以往常常出在奉达皇帝的状、表中的名目,是秦汉以来“上雨泽”制度的延续。对雨水的重视,促进了雨水上报制度的形成。《后汉书·礼仪志·礼仪中》开篇便言:“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

收稿日期 2009-01-15

作者简介:赵玉平(1985-),女,辽宁沈阳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求雨。”^[6]在“上雨泽”制度中,雨、雪的程度也是上报的重要内容。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创立了以降雨天数及平地积雪厚度来判定雨雪大小的标准,如《春秋》中对雨雪大小的界定为“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7]但早期对于雨雪大小的界定并没有统一的量化标准,尤其是以降雨天数描述降雨量的做法,更使得实际降雨量被降雨天数所掩盖。唐代以后,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雨量桶”之类的测雨工具被发明,单位面积上的降雨量才得以体现,上报雨泽随之精确到尺。唐人李肇《祭北岳报雨状》中有“臣至邢州,雨降盈尺”^[8]。张九龄《贺祈雨有应状》中有“昨日申酉之间,云物果应,初含五色,正覆于坛场;未及终宵,更洒于城网,遂使炎埃宿润,虐暑暂消,实冀肤寸之资,毕致普天之泽。”^[9]张九龄在另一《贺雪状》中也提到“遂得盈尺”之雪。

视雨雪为祥瑞的观点不仅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源自“天人感应”思想在政治上的推波助澜。“天人感应”思想首先由西汉思想家董仲舒进行了完整的阐述。他认为“天”会以灾异谴告的形式对国家政治的过失提出警告。所谓“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10]。“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11]。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当出现旱涝灾害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因自己有过错而引发的天怒,进而从人事上来找原因,“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12]。这是一种普遍的观念。因此,当雨违常时,危及农业生产时,施政者便会自然而然地将其与“失政”联系起来。而雨应时节反映的则是政通人和。白居易《为宰相贺雨表》中讲到:“臣闻圣明在上,刑政叶中,则天地气和,风雨时若。”^[13]孙逖《为宰相贺雨表》中也讲到:“臣等伏见近者微旱,圣情勤劳,躬徇物情,修禱祀于神明,焦思忧人,罢欢宴于良节。精诚恳至,上应元通,果叶休征,遂成膏雨……无任欣庆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14]“修禱祀于神明”是对祈雨活动的概括,只有“圣情勤劳,躬徇物情,修禱祀于神明,焦思忧人,罢欢宴于良节”的皇帝才能祈得甘霖以解旱情。祈雨而得雨是对执政者政绩的肯定。宋代洪迈所著《容斋随笔·水旱祈祷》赞扬“以民事介心”的好官,能“以时禱祈”,而治下亢旱也是当地官员为政有过所导致的“天怒”。

如此一来,是否风调雨顺便成为衡量一地官

员为政得失的标准了。随之而来的“贺雨”更多的是对当政者政绩的赞美和肯定。从秦汉时期奏闻皇帝的“上雨泽”到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奏达地方官员的“贺雨文”,从上报朝廷的状、启到上报节度使等地方官员的启、表。从中可见的是对某些朝廷礼仪的普及^[15],也是对歌功颂德对象的普及与转移。S.3399《杂相贺语》“贺雨”条中的“甘泽应期滂足,人心顿安”、P.3625《书仪》“贺雨”条中的“滂泽忽降于膏润,田苗益救于焦劳”,与上文引述向朝廷上报的状、启相比,对降雨程度的形容十分含糊,这其中暗含了两层意思:一、敦煌地区降雨量很小,难以精确测量,遂用“甘泽应期滂足”之类话语含糊而过;二、作文者并非仅为上报雨情,同时亦有讨好上司之义。

敦煌文书中的官方贺雨文亦是对敦煌地区执政者政绩的歌颂。S.3399《杂相贺语》“贺雨”条“尚书亲禱自祈”中的“尚书”,即是对公元914年至924年前后代检校官职位的节度使曹议金的称呼^[16]。该贺语的上报对象可能就是曹议金。“甘泽应期滂足”是对节度使为政的最好赞美。贺雨文的普及化使其失去了最初上报雨泽的意义,最终沦为官场奉承的套语。

P.3637《杜友晋撰〈新定书仪镜〉》“四海庆贺书内外族同”中的“贺雨书”则是敦煌世家大族所用的贺语,同纯粹官方的“贺雨”相比,少了公文化的语言。“稼穡有望,想同喜慰”更为接近大众生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方“贺雨”向民间的渗透。

S.4474《释门杂文》中也有“贺雨”^[17]一条,为佛教僧团或僧人所写的贺文:

为久愆阳,长川销铄。自春及夏,惟增趁奔之辉;祥云忽飞,但起嚣尘之色;鹿野无稼,苍生罢农。于是土庶恭心,缁侣虔敬。遂启天龙于峰顶,禱诸佛于伽蓝;及以数朝,时将不绝。是以佛兴广愿,龙起慈悲;命雷公,呼电伯,于是密云朝,阔布长空,风伯前驱,雨师后洒。须臾之际,滂野田畴。遥山带月媚之容,远树加丰浓之色,芳草竞秀,花蕊争开;功人怀击壤之欢,田父贺东皋之咏。

S.4474《释门杂文》中含有“贺雨”、“律”、“尼”、“庆兰若”等若干篇。谭蝉雪先生在对S.6315《祈雨文》中的“时则有玄宗诸礼士等,并共启于一心,各减家料,就此灵龕,请佛延僧,设斋崇愿”进行研究后认为,该句中的“灵龕”即指莫高窟^[18]。可见佛教僧团及僧人在敦煌地区祈雨等祭祀活动中充当着

重要角色。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 S.4474《释门杂文》中的“贺雨”篇中将“天龙”、“诸佛”等佛教神祇与“雷公”、“电伯”、“风伯”、“雨师”等中国道教神祇并列的写法。无独有偶,在西魏249窟窟顶西壁的壁画上,亦体现出了中国传统道教中风伯、雨师等神祇与佛教题材的交融。壁画中的“雨师”计蒙被描绘成豸首、人身、鸟爪、口喷云雾的形象,与《山海经》中对计蒙“飘风暴雨”的记述相呼应^[19]。斋藤理惠子认为,第429窟窟顶西壁的壁画基本上表现了佛教世界,“不过其中能够看到许多失去了神仙本来意义的中国自古以来的神仙图像,他们只是作为图像连绵持续地融入佛教世界。亦可以说是纯粹的中国佛教世界。”^[20]换言之,佛教在当时就已将包括雨师、风神等在内的中国神怪纳入到自己的神谱体系之中了。笔者认为,这种交融不仅仅是单纯的、单向的表现形式上的融入,在中国本土孕育生长的神仙思想也融入了佛教世界,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形象写照。以致“雨师”、“风伯”在这篇出自释门弟子的贺雨文中,依旧发挥着他们呼风唤雨的作用。

该释门“贺雨”不仅吸纳了中国本土神仙思想中的“雨师”、“风伯”等内容,甚至在格式内容上与官方“贺雨”相对比,也具有鲜明的相似之处。以S.3399《杂相贺语》中的“贺雨”为例,“为久愆阳,长川销铄”与“太阳愆疾,时雨稍乖”,“土庶恭心,缙侣虔敬。遂启天龙于峰顶,祷诸佛于伽蓝”与“尚书亲祷自祈”,“须臾之际滂野田畴。遥山带月媚之容,远树加丰浓之色,芳草竞秀,花藻争开”与“甘泽应期滂足”,“人心顿安”与“功人怀击壤之欢,田父贺东皋之咏”,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只是释门“贺雨”少了些官方辞藻,写得更为生动形象,成功营造了“佛法如甘霖”的氛围。

敦煌文书中的“贺雨”文依据其内容及使用者的不同,当分为“官方贺雨文”、“家族贺雨文”及“释门贺雨文”。从奏闻皇帝的“上雨泽”发展到敦煌文书中歌颂地方官员政绩的“官方贺雨文”,是朝廷礼仪地方化的表现,反映了唐末地方势力的兴起;而“家族贺雨文”及“释门贺雨文”的出现则表现了政治文体的民间化与宗教化,反映出官方文化对民间文化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2][3][16]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M].南京:江

苏古籍出版社,1997:306.333.317.309.

[4]赵和平.杜友晋<吉凶书仪>及<书仪镜>成书年代考[J].敦煌学辑刊,1990(2).

[5]黄永武.敦煌宝藏:第129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407.

[6]范晔.后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118.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64.

[8]董诰等.全唐文(卷三三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347.

[9]董诰等.全唐文(卷二八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3:2933.

[10]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4.

[11]班固.汉书(卷五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98.

[12]王安石.唐宋八大家散文全集[N]/王安石散文全集[C].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220.

[13]董诰等.全唐文(卷六百六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3:6771.

[14]董诰等.全唐文(卷三百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3156.

[15]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545-546.

[17]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5:179//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献(第3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莫斯科: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M].1998:274.

[18]谭蝉雪.敦煌岁时文化导论[M].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8:288.

[19]赵声良.敦煌艺术十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6-17.

[20]斋藤理惠子,贺小萍.敦煌第249窟天井中国图像内涵的变化[J].敦煌研究,2001(2).

[责任编辑 先巴]

[责任校对 红峰]